

# 与距离斗争

## 中国和西方的 古代世界史研究

\* 光启文景丛书  
陈恒 主编

晏绍祥 著



文  
景

\* 光启文景丛书

陈恒 主编

# 与距离斗争

中国和西方的  
古代世界史研究

晏绍祥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史研究

晏绍祥 著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周官雨希  
营销编辑：胡珍珍  
封面设计：周安迪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2 字数：261,000 插页：2  
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69.00元  
ISBN：978-7-208-16758-2 / K·3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史研究/晏绍祥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光启文景丛书/陈恒主编)

ISBN 978-7-208-16758-2

I. ①与… II. ①晏… III. ①世界史-古代史-研究  
IV. ①K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03704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

Horizon



## 出版说明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由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的回溯“汉学”、追求“西学”的学术思潮，看作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正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代人，立足中华文化，承续学术传统，致力中西交流，展开文明互鉴，在江南地区开创出思想文化的新局面，也遥遥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交流、学术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鉴于此，我们秉持徐光启的精神遗产，继承和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创设“光启文景丛书”，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展示当代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大力引介高质量的世界学术精品，既在自身文化中汲取活力，又积极把自身文明带到世界前沿，以高水准的国际性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丛书推重“经世致用”，即是注重文化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既促进学术价值的彰显，又推动现实关怀的呈现。本丛书以学术为第一要义，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

传承性与创新性兼备的优秀著作。以此，关注并回应重要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世界学术的交流对话中，努力打造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其话语体系，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贡献绵薄之力。

丛书推动“东西交流”，即是注重文化的引入与输出，促进双向的碰撞与沟通，既借鉴西方文化，也传播中国声音，并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绚烂的精神成果。丛书着力收录西方古今智慧经典和学术前沿成果，推动其在国内的译介与出版；同时也致力收录国内优秀专著，促进其影响力的提升，发挥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还将留意海内外学者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随笔、讲演、访谈等的整理汇编，结集出版，建构思想操练和精神对话的空间。

我们深知，无论是推动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促进思想的東西交流，本丛书所能贡献的仅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为一脉细流，汇入中华文化发展与复兴的时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启精神，不负历史使命之职。

丛书创建伊始，事务千头万绪，未来也任重道远。本丛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诸多人文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本丛书综合译、著、编于一体，也需要多方助力协调。总之，丛书的顺利推进绝非仅靠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实需相关机构、学者的鼎力襄助。谨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并预致诚挚的谢意。

清代学者阮元曾高度评价徐光启的贡献：“自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追慕先贤，知往鉴今，希望通过“光启文景丛书”的工

作，搭建起东西文化会通的坚实平台，打造上海乃至当代中国学术高原的瞩目高峰，以学术的方式理解和阐释中国，阅读与走向世界。

“光启文景丛书”编委会

2017年8月1日

# 目 录

## 序 言 1

### 01 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 9

#### 引 言 9

#### 专制自为的波斯大王 14

#### 大权在握的总督 22

#### 地方共同体的地位 36

#### 余 论 43

### 02 与距离斗争：波斯、罗马与秦汉帝国统治方式的初步比较 55

### 03 古代希腊罗马史学 71

#### 古代希腊史学 71

#### 希腊化时代希腊的史学 110

#### 共和时期罗马的史学 126

#### 帝国时代罗马的史学 141

04 20 世纪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	167
了解与接受（20 世纪前期）	170
奠定基础时期（1949—1966）	177
恢复与发展（1977—1990）	195
繁荣与深入（1991—2011）	227
简短的结论	259
05 博通中西、影响深远——读《日知文集》	265
从东方专制主义到城邦—帝国论	266
城邦理论与早期中国史研究	274
古代史资料的翻译、介绍与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发展	281
06 古典世界的政治与政治思考	
——评《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	289
西方政治与政治思想中的古典遗产	290
《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特点	293
历史路径还是哲学路径	302

07 西方学术界关于罗马共和国帝国主义动力的讨论 309

引 言 309

古代人的讨论 312

近代早期的讨论 328

防御性帝国主义 335

哈里斯与罗马帝国主义研究的转折 350

最近的走向 363

结 语 371

## 序 言

收入本书的七篇文章中，五篇已作为论文发表在期刊上。其他两篇，《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取自于沛先生主编的《西方史学思想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20 世纪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是本书中最长的一篇，最初是 2012 年应于沛先生邀请为他规划的《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作，该书后因故未能出版，我也没有再理它。这次得此机会，又把它翻检出来，感觉对在中国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学人来说，也许还有点意义，就斗胆收入。

七篇文章中，前两篇即《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和《与距离斗争》探讨古代世界疆土广大的国家如何实现治理，希望通过波斯、罗马和秦汉几大帝国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为所谓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讨论提供点材料。在中国史学界，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经常被连起来使用，有时似乎就是一个概念。然而正如彭小瑜教授指出的，真正有效的中央集权要到近代才出现，其稳定形态是民主政府。古代的那些大帝国，表面看起来君主威风八面。不管是中国的皇帝，还是波斯大王，抑或罗马帝国的元首，的确也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尤其在臣民面前，他的特权地位一目了然，称

之为专制君主并不为过。但在日常的地方治理中，则是另一番景象。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罗马帝国的运转主要依靠城市自治，地方精英在帝国管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帝国晚期城市元老阶层的衰落，被视为罗马走向灭亡的重要表征。对比之下，古代其他帝国似乎也有类似倾向。波斯大王的政令当然可以通达全国，偶尔也会直接插手普通百姓的生活，但在地方治理中，他的权力更多表现为对行省总督以及少部分官员的任免和处置，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不过是个遥远的存在。总督对地方基层共同体的干预大多数时候止步于征收赋税和征集军队，而日常的内政，一般情况下需要地方自理。例如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市，在波斯统治下达到其繁荣顶点，成为希罗多德（Herodotus）口中“伊奥尼亚的花朵”；希腊雇佣兵们经过某个亚美尼亚人村庄时，村长（借用中国流行的称呼）需要自己应付。甚至中国的秦汉王朝，虽然政权相当完善，深入到基层乡里，但乡村的日常管理，基本也属于地方自己的事务。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我们不能不佩服古人的智慧：面对广大的疆域和极其多样化的族群和风俗，以及遥远的距离造成的交通和通信不便，让所谓的中央集权存在于“礼仪”层面，实际的运作让各地自主解决。柏克（Edmund Burke）所谓“明智以及有益的忽略”，是不是古代帝国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秘密”所在？如果这些诞生于铁器时代的大国尚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自治，青铜时代已经出现的那些大国，例如萨尔贡时代的阿卡德王国，当君主宣称让阿卡德的土著成为苏美尔各城市的长官，“使全国只有一张口”时，这是在表达历史的实际，还是在表达理想状态？至于古代埃及的中央集权，除法老对诺姆长官的任命，以及偶尔对臣民上诉的直接干涉外，是否也如我们一般认为的那么彻底，或许也要打点问号了。同理，历史文献中不断出现的古代君主们强化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是否暗示真

正的中央集权在古代并不容易实现，因而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而那些出台这些措施的君主们，到底是在做着非常积极的促进历史前进的工作，还是做着他们那个时代本来难以达成的美梦？

第三篇即《古代希腊罗马史学》的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古典世界史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古人对自己过去的观察和认识。虽然古典世界的历史写作一直是私人事业，写作者的目标是追求真知，或者如希罗多德所说，记录过去的功业，说明发生纷争的原因，但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历史的记录仍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希腊人与东方的接触，尤其是与波斯的冲突，成为史学诞生的重要契机。希腊世界的多中心，使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色诺芬（Xenophon）等呈现出的世界，尽管各有自己的主题，却也都是多中心的。与此相对，深受希腊影响的罗马史学，却从“多”中发现了“一”：所有的事件，最终都导向罗马的一统天下。加图（Cato）把意大利描绘为罗马崛起的舞台；李维（Titus Livius）把罗马统一地中海作为基本线索；帕特克鲁斯（Paterculus）把自己所处的皇帝提比略统治的时代视为历史发展的顶峰；希腊史学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s）、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也都把罗马统治作为既定事实。因此罗马史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具有更鲜明的“近代”意味：整个地中海的历史，都是罗马的历史，是罗马让地中海那个多姿多彩的地区，具有了有类近代民族国家的统一性。生活于 21 世纪的我们，可能难以苟同罗马人的观念和角度，但对生活于帝国时代的罗马人还有行省居民，那或许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五篇可以视为一组，是中国学界对古代世界的理解与观察。一篇介绍 20 世纪中国学界对古代世界史的研究，一篇介绍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的泰斗林志纯先生的学术。中国对古代世界的认

识，最初发端于了解异域、救亡图存的需要。因为最初的目标是如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很长的时期里，学者们较多关注器物方面。古老的希腊罗马世界因为能够贡献的器物文化较少，只能向隅，处于被冷落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被赋予了证明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进而证明中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角色。加上苏联体系的影响，世界古代史终于在历史学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尽管当时条件极其不利，但新中国第一代史学家们筚路蓝缕，开拓进取，仍然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在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和具体研究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日渐融入世界，人民经济和文化水平提高，对世界史的需求，包括对古代世界的兴趣也日渐增强。世界古代史获得了相对较好的发展空间，资料积累和科学研究等都日渐向国际学界看齐。当今成就的取得，与老一辈学者树立的榜样有着莫大关系，因此第五篇试图通过介绍林志纯先生的学术，说明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发展固然需要客观环境助力，但个人的努力和贡献同样重要。如果没有林志纯先生当年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和科学研究上的身体力行，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不大可能有今天的成绩。而林先生的精神和工作动力，又来自他对中国命运的关心。他对古代中国民主传统的发掘、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对中国历史总体特征的探索，既是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探索。治史从来不是纯粹的书斋学问，古往今来的大学者们，似乎都是一方面尊重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带着程度不等的现实关怀。两者之中，尊重历史事实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否则我们所谓的视角可能如英国学者罗兹（P. J. Rhodes）所说，会让我们在历史上找到我们希望找到的东西，忽略更多本应注意的方面，甚至扭曲历史事实。那样的历史研究，早已脱离历史学的基本要求，违背

了史学研究本来的意义。

第六、七篇一组，大体上属于学术述评，都与当今西方对古典世界的研究有关。一篇评论《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一篇评述西方有关罗马帝国主义的研究。两者的学术史都说明，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随着时代的不同，或者即使处于同一时代，因为不同的人关注点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看法，进而影响到对相关问题的呈现和阐述。从政治哲学角度与从历史角度撰写的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虽然都是政治思想史，却会展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前者或许更关注思想家个人的思考与独创，而后者更愿意从历史背景去观察思想者的反应，突出思想家生活的环境，寻求这种反应的共性与特性，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的，更关心亚尔西巴德（Alcibiades）具体做了什么。从这个角度去观察西方对罗马帝国主义的认识，或许会比较容易理解，同为希腊人，公元前2世纪的波利比乌斯（Polybius，又译波里比阿）试图去说明罗马何以在万国之中取得成功，而公元前1世纪的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和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却关心罗马怎样才能合理地行使权力，以维持罗马的长治久安。近代早期追求国家强大的西欧人，从罗马持续的扩张中看到了自由带来的国家强大；到19世纪的蒙森那里，罗马的征服活动，成为民族国家式的统一战争；及至20世纪后期，因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非殖民化运动，罗马帝国主义成为了哈里斯（William V. Harris）批判的靶子，代表了罗马国家制度和社会的“病态”！可以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将来对罗马帝国主义的解释，或许包括对历史上一切问题的解释，肯定还会出现新的模式。

这里不由得让人想起克罗齐那句几乎被人用烂了的话：“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个看似矛盾的命题希望表达的，是

“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易言之，我们对历史的关怀，表达的始终是我们当前的兴趣。由于每个时代面对着不同的世界，遇到不同的问题，由此决定了人类向历史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希望寻求的答案。“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里，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原始的文明形式是很粗糙和野蛮的，它们被忘记了，或很少被人重视，或被人们误解了，直到那被称为浪漫主义或王政复古的欧洲精神的新阶段才‘同情了’它们，就是说，才承认它们是它自己本身的现在兴趣。因此，目前被我们看成编年史的大段大段历史，目前哑然无声的许多文献是会依次被新的生活光辉所扫射，并再度发言的。”<sup>1</sup>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和中国的学人们，虽然面对的都是古代世界，但从本书简短的回顾中，我们会发现，两者关注的问题和寻求的答案，都存在非常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距离”决定的：西方学者把希腊和罗马视为他们的古代，努力从中寻求他们的“根”，拉近古今之间的距离；中国的学人们，更多从寻求历史规律出发，把古代作为迈向当今世界的一个环节，力图从过去的世界寻求当今世界的由来。两者都是在与距离斗争。前者希望消除两者之间的“距离”，倾向于从正面去寻求古代的“成就”；后者则力图说明两者之间的“距离”，更多地关注古今之间的差异和古代世界的弱点。另一方面，古代世界毕竟距离今天相当遥远，

---

1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2页。